

难忘建中

○ 傅振邦（1991级水利）

今年是1字班毕业20周年，大家都在期待着校庆日重逢再聚首。我们水工13班却已“金瓯有缺”，郭建中同学八年前永远离开了我们。

建中是我们班老黄牛式的模范生，班上同学一直称他为“老郭”。老郭于我，是亲密的室友同窗，是交心的挚朋诤友，是可亲的手足兄长。这样的好同学好兄弟，怎么能忘却呢？

老郭是极有潜力、极有才华、极有人缘的一位杰出同学。他情理兼修，堪谓德才具备，尤其是他的为人处事绽放着独特的人格魅力。惜乎天妒英才，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期间，不幸身患绝症，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后，还没来得及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就于2008年1月18日与世长辞了。他的离去，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是我们水工13班无可弥补的缺憾，是1字班的巨大损失。



2002年，郭建中学长于美国旧金山

在老郭患病与病魔抗争之际，我先后于2005年、2006年两次赴美，都到旧金山会过面。2005年9月那一次，我行程紧，是他和夫人武少楠半夜驱车一小时到酒店与我相见。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已患病，看见他戴着一顶帽子，脸庞瘦削，精神不那么好，只是那温煦的笑容如故，那双大大的眼睛还是像以前一样透着真诚的张力。经年未见，久别重逢，分外高兴。聊天中他告诉我学习的情况，轻描淡写地说他得了上颌窦癌。我那时对此没什么概念，但一听到癌字，心里一沉。看到他还比较乐观，说年初做过一次手术，治疗情况不错，自己也在规划未来康复后的职业道路，心里稍微舒坦了些。依依惜别后，2006年12月我正好有机会到美国一所大学学习一阵子，便特意经过旧金山再次看望他。这时我知道他的病情在恶化，已不容乐观。我专门来到他们两口子的住处探望，那是一座郊区的三层小楼，房子不大，布置得很温馨。尽管有心理准备，见面后还是大为吃惊，这个时候他手术后未控制住癌细胞扩散，脸上的病灶明显。我噙着泪水，紧紧握住他的手端详，他的眼神忧郁而坚毅，反而安慰我说还好。即便是病情很重，得定期到医院接受检查治疗，他还边休养边学习弹钢琴，甚至还在房子边开辟了一小块菜地。那一次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一起怀旧，一起谈论他在美国的生活，当

然还有我在企业工作的情况。也许是为了让我高兴点，他还即兴弹了会儿钢琴，琴弦声声扣动着我的心弦。谈话中他高兴地提及，胡和平老师来旧金山看过他。在清华水利系时，他与胡老师在同一个研究组，主要从事防洪、水资源方面的研究，深受胡老师赏识。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相信要不是患病，他学成后一定迟早会回清华的，因为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根。辞别之际，少楠热情地给我俩照了好几张照片，我们脸上都充满笑容，但实则心里都很悲伤，情知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了。果真，那天的合影成了我和老郭最后的合照。

等我再次见到他，是少楠和老郭的哥哥从美国带回的骨灰了。那是2008年1月30日，我和王殿常、傅旭东等同学专门到机场迎接老郭魂归故土，唐杰老师也特地赶去迎接了。清华大学水利系非常不错，傅旭东、陈武等同学和有关方面忙前忙后，在校内专门为老郭举行了庄重的追悼会，清华不少老师和同学都参加了，送了老郭最后一程。大家都对少楠交口称赞。他们俩相知相爱，感情特别好，共同奋斗双双赴美留学，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尤其是老郭患病后，少楠和她父母不离不弃，全力以赴悉心照看三年多，直到最后一刻，让老郭得到了最好的看护和慰藉。根据老郭家属的意愿，他的骨灰送回内蒙安葬。我和王殿常同学、李银生同学将他的骨灰从北京一直护送到呼和浩特公墓，安放在他哥哥选好的地方。就着这次到内蒙，我们还陪同少楠回了趟老郭在内蒙卓资农村的老家，那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家乡。初冬的内蒙寒风凛冽，地上覆盖着厚厚的冰雪，他家的平房静静地矗立在村子中，我们在

那里怀念他，宛如看到了老郭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的身影。老郭走后，没有留下子嗣，留下的是他国际国内发表的数十篇高质量论文和在师友中不朽的令名。

1991年9月，老郭从塞北农村，我从江南小山村，一起来到清华13号楼，走到一起，不仅一个班，还住在了一个宿舍。出身寒门的类似成长经历，率真坦诚的相近性格禀赋，自强不息的共同追求，让我们很快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老郭比我大3岁，刚上大学那会儿我懵懵懂懂，很多日常生活的小事都是他教我、关照我，偶或善意地批评提醒我，我始终把你看作是大兄长。大学的五年，我们很多很多次一起去上自习，一起去食堂，一起喝啤酒，一起到校外游玩，还一起练过摊打过工。我们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说，彼此心头的任何秘密都可以分享。水工13班是个温馨的集体，班风好，凝聚力强，同学们相互帮助。学校校园大，那时同学们基本每人骑一辆自行车，每当我的自行车有点毛病时都是他或者陈武帮我修理。事后回想起来，老郭对我大学五年里的思想、心智、学习等方面的成长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帮助。能够在大学期间遇上这样的好兄弟，确实是我的幸运。

1996年毕业时，他选择留校读研，我选择去三峡参加工作。7月下旬的一天，我告别清华园，从学校到西客站的公汽上，我一路思绪万千，既怀着对过去的留恋，又怀着对未来的忐忑。当我到达西客站时，惊奇地发现老郭和赵建钧同学提前在车站等着我，两人还拎着啤酒在喝呢。不是已经在校内道别了吗，他们怎么跑到车站来了？我心里犯嘀咕，他俩迎上来接我，眼

□ 值年园地

里都红红的。我知道，此去一别，各奔东西，不知道何年何月能再见面，他俩专程来送我了。我不禁热泪盈眶，接过递来的啤酒咕噜噜喝起来。曾有好多次晚上，我们三个一起都这样喝过，浇浇心中的块垒。大家没有再过多说话，主要是干喝酒，周围旅客的目光都有点怪怪的。直到我上火车，他俩才回转。不管过去多少年，我都清晰地记得老郭和老赵拎着酒瓶在西客站给我饯行的情景，记得三个青涩的穷小子在站台上无限惆怅举瓶喝酒的样子，这一刻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去三峡工程工作后，尽管在小城市条件艰苦些，但在世界最大水利工程干，心情很舒畅，一切都比较顺利。老郭在学校读研很勤奋刻苦，发展也很好。毕业头两年我们尽管没机会见面，但一直保持联系，彼此都了解各自的学习、工作情况。1999年，突然有一天他给我电话，说要陪张光斗老先生来三峡工作。我不禁喜出望外，原来系里派他陪伴张光斗教授。那时张先生已经快90岁了，但依然关心三峡工程建设，是国务院刚成立的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老人家要来三峡工地开展质量检查。我那时已经给三峡总公司主管技术的副总经理王家柱学长（1965水利）当秘书，他是张老的学生。张老在三峡工地主要由王总陪同和汇报，这样我自然与老郭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我俩有幸共同跟随水利工程大师们攀爬大坝仓面、进导流洞、下基坑、上船闸，在三峡工地上留下了共同身影。

从1999年直到2000年8月我出国留学，那两年我与老郭见面频繁，毕业后工作上能有交集，真是缘分。与本科学习时

相比，那个阶段我们对人生对社会对专业的理解更深了，交流也更深了，彼此谈心，相互学习，相互鼓励。在此期间，他硕士毕业留校工作了，准备出国读研。实际上，毕业之后我们在职业、学习、生活的一些重大选择上，都彼此沟通商量，他依然像兄长一样给我指导。

2000年后，我们见面就不多了。2001年底我从英国毕业回国，他已于当年8月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中间他回国我们见过一两次面，此外就是通过通讯保持联系，直到2005年、2006年我两次赴美见面。尽管不能经常见面，但我们的心的相通。现在，老郭离开八年了，可在我心里他并没有远离。他这个人充满大爱的，不管是对自己的妻子和家人，还是对同学朋友，还是对老师学生，甚至对素不相识的人，都是满腔热忱，真心实意。在他患病两次手术数十次化疗最艰难的日子里，老郭带病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其顽强的毅力和对生命的达观热爱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正因为如此，凡是与他交往过的，没有不称赞他德性醇厚的。我想，这正是他独特人格魅力所在。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每个人都只是过客，但人生的意义各不相同。老郭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36年，但他的人生是丰富充实的，他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他短短的一生是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生动写照，他的水利学术生涯虽然短暂但已崭露头角。他的至真至诚，他的坚韧不拔，他的奋斗不已，他的博大胸怀，都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广博的爱，是满满的

正能量。我与他兄弟般的情谊永如醇厚美酒，每每忆念他时，我既感到刻骨铭心的悲伤，更感到向上向善的雄浑力量。

老郭走了，长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

但很多人都深深的爱他，深深感念他。我总觉得，他只是去了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世界，他依然与我们在一起，注视着我们，祝福着我们，带着他那温煦的笑容。

十年啦，你还好吗？

○张 超（2002级自动化）



一转眼的时间，大学毕业已经步入第十个年头了。新一届的二字班都要毕业了，我们也从当年的男生女生变成了奔四的“老腊肉”，很多同学都已经为人父母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否曾想起当年的大学生活？

你是否曾想起，我们入学时，王大中校长那斯文儒雅的风范、浑厚磁性的声音，深邃得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哈利波特里的邓布利多。校党委原书记方惠坚老师给我们作成才报告说，“明年我就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了”，台下掌声雷动。现在，年过八旬的方老师还是精神矍铄地给同学作报告，依旧声如洪钟，台下依旧掌声雷动。

你是否曾想起，我们入学时，紫荆一、二、三号楼刚刚竣工，旁边还是一个满是吊车的大工地。那年冬天的紫荆楼群间，打过一场痛快的雪仗。我住在紫荆一号楼，每天一出阳台就能看到东南方向很远处一个高楼，上写六个大字。到我搬走的那一天，终于看清楚是“北京林业大学”。

你是否曾想起，我们大一时，经历过一次空前绝后的“非典”，停课的时候每天在荒岛、小树林打牌，脖子上戴着“狗牌”，在南门口和亲人、朋友隔着栅栏相见。当时有一个笑话，讲温总理非典时期来学校看望大家，就有同学跑来说“总理都来学校了，你们的牌快别打了”。

你是否曾想起，我们大一时，多数院系还不允许自带电脑，新生在主楼计算机开放实验室前常常排起长队，无聊的人一边排还一边数下机出来的男女比。这样的管理在大二时形成了井喷，我还记得室友通宵打一个叫“拼刺刀”的小游戏，我早起看他打游戏还很好奇地问：你起这么早打游戏？他说，哪有，我就没睡。

你是否曾想起，吕冀蜀老师给我们上过激情洋溢的军事理论课，吴文虎老师的